

数智时代青年的意义世界何以建构?

——基于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考察

王 飞¹, 骆小春²

(1.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工业大学基地; 2. 南京工业大学法政学院)

摘要:意义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源泉。马克思生活理论以人为主体的,以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内容,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致力于建构对人有意义的生活世界。数智时代重构了青年的生活世界,使其面临主体身份多元化、交往关系悬浮化、实践场域隐匿化等数字化转向,形成新的生存挑战。数字技术所构筑的虚拟时空对青年生活世界的价值意义造成一定侵蚀,表现为精密算法逻辑下的主体消解、虚拟交往空间中的道德缺失及隐匿实践场域里的价值迷失。建构意义世界是人的本质体现,其价值旨归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过程就是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的过程。青年是数字技术革新的推动者,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引导青年在数字生活时空中主动建构意义世界,是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唤醒青年对于意义世界的觉察和认知,指导青年端正数字认知、强化数字主体身份,培育数字道德素养、优化数字交往生态,丰富数字劳动实践、丰盈数字文化体验,使青年能够在纷繁复杂的数字世界中自觉建构意义世界,追寻真、善、美的自由和统一。要通过意义世界的生成,促进青年深化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使其能够诗意地栖居于数字社会,创造有意义的数字生活,成为适应数智时代发展的数字公民。

关键词:马克思生活理论;青年;数智时代;数字生活;意义世界;数字公民

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有限生命的意义是人之为人的终极关怀。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载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意义,追求精神生活,从而形成意义世界。意义世界中的“意义”是指支撑人在现实生活中安身立命、处理社会关系、实现自我的价值理念,一旦意义缺失,日常生活就会失去价值与活力,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将停滞。当前,数字技术正全面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社会发展正加速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而青年一代是数字生活的

“原住民”,既是数字技术革新的推动者,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主力军。然而,数字化浪潮所催生的快节奏、碎片式、虚拟化的生活场景充斥着大量良莠不齐的数字信息和精密诱人的算法逻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极易在这种算法控制、主体迷失、网络失序中消解。青年若沉迷于数字生活世界,停止追寻意义的脚步,就会从虚拟走向虚无,成为数字化的存在,甚至会沦为片面的、单向度的人。

马克思哲学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人所生活

引用本文:王飞,骆小春.数智时代青年的意义世界何以建构?——基于马克思生活理论的考察[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5):28-3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BFX03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4SJYB0170);南京工业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SZ20240204)

作者简介:王飞(1982—),女,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E-mail:wf@njtech.edu.cn

的现实世界,更致力于为人的生活世界确立价值和意义。“马克思哲学文本中内涵着丰富‘生活话语’,构成了一个深刻揭示生活本质及其哲学意义的‘全面生活理论’。”^[1]马克思生活理论以人为主体的,以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主要内容,深刻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本质。马克思认为,生活是社会活动的基础,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首先,从人与自身的关系来看,在生活世界中追寻意义是人的本质体现。“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⁹⁶“生命活动”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构建人的意义世界”是其全部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一以贯之之道^[4]。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交往是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人们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交往,形成社会关系,而社会就是人们交往的产物。最后,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结构总是从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5]⁵³。人在追求意义的实践活动中突破自身的有限性,发展自己的能力,彰显自我的存在价值。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青年的精神面貌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未来。以马克思生活哲学视角关照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生活世界的意义生成,对于唤醒青年对意义世界的觉察和认知、维护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辩证统一、促进青年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青年生活世界的数字化挑战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社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深刻改变了青年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重构了社会生活,推动从个人到社会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生活空间突破了时空界限和交往局限,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这一技术所构建的生活场域已成为青年的存在性条件和生活背景,数字生活成为青年的主要生活方式。然而,数字技术所形成的虚拟世界

也在悄然侵蚀生活世界的现实感,呈现出虚实交融、迭代迅速、多元复杂等特点,青年生活世界正面临主体身份多元化、交往关系悬浮化、实践场域隐匿化等数字化转向,进而形成了新的生存挑战。

1. 主体身份呈现多面复杂镜像

人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生活理论的出发点。在数字社会中,个人不断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迁移流转,“‘数字化生存’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社会经济层面都从预言走向现实。云计算、物联网、5G 技术及人工智能纷纷从研究前沿转向近距离生活。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6]。作为享受数字生活的主要群体,青年乐于体验并接受数字新技术和新事物,即时便捷、智能炫酷、持续迭代的数字生活方式与其思维活跃、追求新奇、敢想敢试的性格特点高度契合,而元宇宙、腾讯会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平台也拓展了青年的学习、生活、工作和娱乐载体。在数字社会中,青年既是实体的存在,又拥有由数字符号所构建的数字身份,体现出虚拟特质,并拥有不同的“数字分身”。虚拟交往空间增强了青年人际交往的开放性和娱乐性,其可定制、可选择、可掌控的个性特征为青年营造出与现实生活迥然相异的虚拟人生,青年的“人设”创建和身份表达更加灵活多样,在不同维度上展现自我多样性,主体身份呈现复杂的多面镜像。数字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了生活环境的全方位变革,也推动着青年主体身份和社会心理的动态变化。与现实组织相比,虚拟社群对青年更具吸引力,在这里,他们常以虚拟身份袒露内心的喜怒哀乐,表达真实的情感和想法。

2. 人际交往遭遇悬浮疏离境况

马克思认为,交往是“主体间”的互动,人与人在交往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¹⁸。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交往中的时空局限和阶层界限,极大拓展了社会交往的便捷性与可能性,“也在深刻地影响着随着时代而变化的社会交往模式,迅速地重塑社交格局”^[8]。作为人与

人交往的基本形式,语言是基本的交流工具和重要的文化符号。在数字社区中,青年的交往语言以个性化、多样化的数字符号为代表,如表情包等文化符号伴随社会热点、网络流行语不断更新,将具象生活、深层情绪与虚拟符号创意拼接,构成了青年数字交往中独特的表达方式。青年依赖这些数字符号进行交流,调节情绪,引发共鸣,并借此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他们似乎已难以找到更合适、更精准的社交表达途径。“动静结合、文本开放、符号意义在流通中被不断解构与重构,形成新时期网络化时代独特的数字文化。文化从原料、内容、传播与交流方式都实现了数字化转型。”^[9] 即时开放的评论互动、实时弹幕、点赞打赏等数字交往行为已成为青年交往的新常态,这构建了一个新的“陌生人世界”,其信息流通和匹配程度甚至超过熟人社会。数字技术既拉近了青年的物理距离,又拉开了他们的心理距离,“面对面”抵不过“键对键”,青年的交往关系悬浮于虚拟时空,难以在真实世界落地。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疏离感的加剧和交往黏性的降低,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多维,传统社会里那种亲密深沉的交往关系渐趋稀薄。交往环境的虚拟化也带来了公共秩序一定程度上的退隐,社会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对社会信任造成了巨大冲击,社会公信力面临考验。

3. 实践场域面临数字网络转型

马克思生活理论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通过实践不仅创造和改变外部世界,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塑造。在数字社会中,青年的实践场域面临数字化转型:一是从生产场域来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与新应用蓬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大幅减少,新产业与新业态应运而生,如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去雇主化、平台化等灵活生产形态,且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孕育出了以信息和数据为对象的数字生产实践。“网络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更多人从事网络劳动,实现了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10] 产业形态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对青年的实践能

力提出了新要求,同时,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不确定性增加,“变化”成了生活世界常态,一些青年因此产生了心理焦虑和本领恐慌。二是从生活场域来看,网络生活已成为青年的基本生存方式,网络空间是其主要活动场域。青年栖居于数字生活世界,展现出全新的生活样态。如“宅”成为青年中流行的生活现象,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为青年的“宅生活”提供了高度便利,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社会活动等都可网络建构的生活世界中完成,即使足不出户,青年也可通过网络进行办公、购物、社交、恋爱,成为社会生活的“隐形人”。在数据平台、大数据、叠加制造等各类新技术的支撑下,生活内容被提取为数字数据,并通过高度集合与质性互动形成虚拟化时空。人类生存成为以数字数据为中介、以智联互动为技术、以数字化生存为内容的非物质化的生活世界^[11]。然而,一些青年的生活被抽象为虚拟的存在,面临虚无化和空心化的挑战。

二、数字生活中青年意义世界的消解

马克思指出:“生活决定意识”^{[7]31}。数字社会转型拓展了青年自由发展的时空场域,既为青年的生活实践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对意义世界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文明尤其是现代数字技术,使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相互消解,其本质特征是生活世界僭越意义世界。数字技术最大的风险,就是使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虚拟中退隐并可能最终走向消散。”^[12] 在数字生活转型进程中,青年生活世界往往被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全方位包围、全场景浸润,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技术不仅塑造了青年的数字生活方式,也通过其所构建的虚拟场景对青年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造成侵蚀,一些青年陷入其中,逐渐迷失生活方向,甚至失去了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意识和能力。

1. 精密算法逻辑下的主体消解

在万物智能互联的数智时代,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智能算法不断从虚拟空间向现实生活延伸。“在人人皆数字的背景下,数字身份被定位,数字轨迹被跟踪,数字行为被记录,数字交往被公开,在某种程度上,物理世界的复

杂人成为数字镜像世界的透明人。”^[13]算法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日益替代青年进行思考和选择,对其主体性产生深刻影响。一是主体身份的缺失。青年的日常生活时刻被各种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所记录收集,形成各类数据。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算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结合特定预设对用户的思维逻辑进行评估预测,进而迎合用户的思维习惯进行信息的精准投放。算法逻辑使青年陷入主体性困境,在算法面前,青年被透视简化为各类数据的集合,其主体精神被数字技术消解,成为可被预测和计算的客体。工具理性下的“人”似乎成了机器化的存在,而机器却越来越被赋予“人”的智慧和功能。二是认知的片面化。在社会节奏加速、碎片信息加剧、算法逻辑加深的背景下,青年极易进入“信息茧房”,倾向于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认知视野因此窄化。形形色色的算法为青年精准投喂相关信息,为其量身定制日常生活,如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到“网红打卡点”的跟风行为,青年的生活被算法推荐不断挤压和填充。而算法的后台由人为设定,根据用户偏好屏蔽异质信息,其推荐机制成为青年信息获取的筛选者和守门人。三是思维能力的弱化。沉浸式的算法推荐使得青年与网络应用深度捆绑,考验着青年的思辨力。面对网络信息浪潮下的无效内容和错误言论,一些青年缺乏独立、深入的分析和辨别能力,容易盲目跟风,如 ChatGPT 等智能助手的兴起,更是深刻塑造了青年的思维习惯。“在今天的经济结构中,网络与现实界限的相互嵌入使得人们的日常行为不但潜在或显在地受到算法的左右,更日益形成对算法的依赖。”^[6]当自主解决问题的尝试被即时生成的答案所取代,青年也就失去了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减少了批判性思考的机会,思维独立性受到冲击,甚至形成思维惰性,其主动学习、理解、质疑和创新的能力逐渐消退。

2. 虚拟交往空间中的道德缺失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提升了网络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各类社交平台将青年集结成新的群体,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和维护者,个体拥有更多的表达通道,个人的情绪和观点能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

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一些带有认知偏见、情绪偏激的意见经网络发酵后快速传播,引起大众热议和社会影响。网络空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是现实生活及社会心理的投射和反映,呈现出虚实相融、质态多元、成因复杂、传播迅速等特点。一方面,交往空间的虚拟特性降低了青年的道德自律意识。数字化、符号化的存在方式削弱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责任感,存在去伦理化、去道德化等风险。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借助网络形成放大效应,不同个体的道德行为呈现虚拟隐身、多元复杂的样态,形成纷繁复杂的网络众生相。如,一些青年为夺人眼球、引流吸粉,不惜挑战道德底线。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虚拟和开放又催生了青年个体情绪的宣泄与放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互动平台的推波助澜,“情绪牵引”成为网络舆论的导火索。网络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私人叙事成为公共议题,专业、严谨、理性的叙事被世俗、琐碎、感性的生活叙事深度解构,事实与真相在曲折反转中变得模糊,不断冲击网民的道德认知和判断力。“后真相的实质是立场先于事实,人们先确立立场,然后挑选事实,再做出判断。”^[14]真相常被过激情绪掩盖,网络戾气蔓延,集体情绪被个别利益诉求者煽动,进而触发社会敏感点,加剧大众不满和不信任感。“网络时代的道德审判和法律制裁有时不是权威人士的宣判,而是普通网民的千夫所指。情绪压制了公正,全民法官时代让回归常识变得比追求正义更困难。”^[15]网络传播时代,负面事件和情绪往往更容易引起青年共情,激烈言辞、煽动性话语、夸张叙事等极易触动其敏感心理。如,一些青年将个人不满代入公共讨论,催发群体情绪,甚至酿成线下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全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3. 隐匿实践场域里的价值迷失

实践场域的虚拟化、碎片化和去中心化倾向,对青年的思维、行为和心理都产生了影响,使其生活呈现碎片化状态。首先,面对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的压力,一些青年产生了“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焦虑与倦怠,对生活意义产生困惑。有的青年内心孤独、焦躁,降低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预期,更关注“此时此刻”

的感受,缺乏对人生的长远规划。其次,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通过网络蔓延,消解了青年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一些青年出现价值观偏差,以“利益”取代“价值”,将财富、名誉、地位作为行为的主要动力和终极目标,将快速有效、即刻变现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准则,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刺激,失去了持久的定力和追求审美与崇高的能力。“数字技术的赋能与裹挟加速着工具理性成为青年日常生活中日益渗透与扩张的主导型思维,当面对数字社会转型所不断呈现的新的社会结构转变与社会困境时,青年却显得倍感无力而难以为继。”^[16]再次,在信息碎片化场域中,一些青年的意义世界被生活日常所限制,精神陷入混沌虚无的局面。趣味性、娱乐性内容成为部分青年社交群体的中心议题,网络圈层化效应日益突出。“网络圈群可以成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和深切认同的中介载体,但也可能因为封闭排外、感性娱乐等特性而引发排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风险,甚至成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甚或错误意识形态渗透、操纵的工具。”^[17]一些青年沉浸在“饭圈”为其带来的通俗化、浅层次的娱乐刺激之中,耗费大量时间。调查显示,86.1%受访者会漫无目的地刷手机,“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年轻人越害怕错失,越会保持在线,而越在线,越害怕失去,最后就是‘永久在线,永久连接’”^[18]。大量无意义的信息充斥网络空间,不断瓦解青年生活本应具有的深度与意义。

三、数字生活中青年意义世界的建构

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意义是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然途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5]53}。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生活理论的核心要义和终极旨归。意义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是人通过实践主动建构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提升的精神产物。人在建构意义世界的同时深化了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提升了自身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品质,从而实现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存在的这种现实性,并不仅仅

表现为空洞的形式,而是自始便与人的多方面需要相联系,并以真、善、美等价值意义为其实质的内涵。”^[19]因此,建构意义世界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价值旨归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过程就是不断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当今时代,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意义世界的迷失,人的生存意义受到质疑,精神困境愈加深重。”^[20]意义是生活世界的目标和价值导向,在数字生活时空中建构意义世界,是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意义世界的生成,促进青年完善人格、充盈生命、提升能力,使其能够诗意地栖居于数字社会,创造有意义的数字生活,最终成为适应数智时代的全面发展的数字公民。

1. 求真:强化数字主体身份

意义具有主体性,人是建构意义世界的主体。马克思指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5]83}。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数智时代已然到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正发生着智能互联,数字技术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质引擎。在这一背景下,端正数字认知、强化数字主体身份是青年自觉建构意义世界的基础。

一方面,要增强青年的数字主体意识,更好地认识数字自我。“学知识、求智慧都旨在获得真理性认识,使主观与客观真实相符合,如实地而非虚妄地反映真实——包括现实的真实面貌和人生的真实意义。”^[21]意义的生成源自“我”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我”在意义建构中具有优先地位,对象的意义以“我”的本质力量为转移。在现实社会,生命实体作为主体,通过亲身参与的生命活动作用于外部世界,建立起人与现实世界的主客体关系。而在数字社会,现代数字技术和网络载体建构出一个虚拟世界,实现了时空的拓展及人的生活场域的延伸。数字世界由数字网络搭建而成,人无法身临其境,而是要通过数字化身份进入其中,因此,每个人都是现实自我与数字自我的集合体,数字自我是被赋予编码意义的数字符号,是现实自我的虚拟在场,也是生命实体在数字社会

的虚体代言。数字自我不是另一个自我,也不是现实自我的他者存在,而是现实自我在虚拟社会的数字化标识,具有主体的身份特质。数字算法表象上面向数字虚体收集数据、精准计算,实则把握的是现实主体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这就要求青年重新认识自我,增强数字主体意识,强化数字身份认同,进行新的自我建构。青年要加强对自我的审视和定位,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联结起来,调节平衡虚实世界的自我身份,维护现实自我与数字自我的内在统一。只有完成从现实主体到数字主体的身份确认,再回到现实主体的本真状态,达成虚实主体的双重建构,青年才能真正成为契合数智时代发展要求的生活世界的主体。

另一方面,要增强青年的数字思维能力,更好地认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催生了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传统学习方式强调知识的获取和记忆,注重学习时间的长度和资源的广度,忽视学习者在复杂环境下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削弱了传统学习方式的优点,引发了数字认知困境,造成了算法依赖。“在理性的层面,人性能力以逻辑思维为形式,以实然与应然、真与善的统一为实质的指向……无论是真实世界的敞开,抑或当然之域的生成,都展示了理性能力的深沉力量。”^[19]在数字环境中,青年要提高数字认知能力,学会判断和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打破算法推荐壁垒,消除主观偏见,在多元信息中作出理性和独立的判断,增强主动获取、辨别、思考信息的能力,争取更多主动权和自主权。同时,要加强数字理解能力,明确数字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ChatGPT 等人工智能应用只能是人们思考与决策的助手,绝不是替代主体的思考者,尽管人工智能在算力、算法等方面具备显著的逻辑思维能力,但它无法超越人类思维的整体性与创造性。要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形成正确的认知,既要积极学习并探索数字化生存新方式,又要认识到其影响和局限,保持反思和定力,避免过度依赖和盲从。此外,要提高数字创新实践能力。数智时代的知识学习与传播结构正以互联网为中介向人机循环交互模式转变,这对应用者的高阶认知、批判思维、意义建

构、跨界创新及元认知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年要主动拥抱数字变革,积极参与数字协作与沟通,以数字技术赋能知识学习和能力跃迁,利用数字技术协调多元资源、获取更多机会,从而更好地参与数字经济社会的创新实践。

2. 向善:优化数字交往生态

交往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也是生活世界中鲜活生命的具体体现。马克思强调:“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7]362}数字技术重构了青年的交往生态系统,数字时空的虚拟性、开放性、多样性、平等性等特点增进了青年之间自由、即时的交往,同时导致交往环境对青年的约束力减弱,社会交往中的道德伦理风险加大。在引导青年遵循数字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增强数字责任意识的同时,要优化青年的数字交往环境,在网络空间形成向善向上的道德行为及文明理性的交往关系,营造清朗有序的数字生态。

从交往个体来看,要着力培育青年的数字道德和数字素养。数字时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活动区域,人人都是麦克风和传声筒,可以随时随地表达、传播个人的观点和诉求,同时每个人也都有维护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个体在网络中以数字虚拟主体展开活动,但其行为始终由现实中的生命实体所主导和承担,数字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通过数字主体得以建立和维护。个体的虚拟隐身并不意味着道德责任的消失,其背后的现实实体仍是一切数字行为的责任人,无论在现实还是虚拟世界,都要遵守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网络是摆在网络主体面前的试金石,也是‘养成性情之德’的事功之地。”^[22]增强青年的数字道德意识,促进其实现现实生活和数字生活的有机统一,可通过数字技术促进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的有机融合。如,将道德素质、技术素养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培养青年的“利他”精神,培育数字社会公德,形成数字主体、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的和谐共生;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主动遵守数字社会行为规范,诚信开展数字交往,理性进行数字消费,养成文明、理性的上网

习惯;指导青年在数字空间保持宽容平和的心态,尊重差异,理性表达,在分享和传播中展现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增强青年的道德意志力,引导其合理使用数字技术,规范自身的网络言行,使慎独慎微的道德修养在网络空间落地,提高自律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引导其主动维护数字社会安全,提高道德判断与规避风险能力。

从交往环境来看,要加强数字空间治理。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43}。人与环境相互塑造、相互统一: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环境影响人,同时人也在改变并创造着环境。网络环境的虚拟和自由是相对的,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人总要受到客观必然性的制约,虚拟空间更需要现实规则予以约束,否则将乱象丛生、混乱无序,影响青年的自由发展。要确立法律在虚拟空间的在场地位,完善网络空间治理制度,明确网络道德问题的惩处原则,划定网络自由的边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应用短视频、动漫等传播广、易接受的数字形式解读法律条文、解析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加强警示,形成震慑效应,促进道德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坚持以人为本,打破“算法黑箱”,保护青年数字隐私,维护青年合法数字权益。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网络宣传的效果,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网络形式宣传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大国工匠、科技领军人才等榜样人物的先进事迹,引领崇德向善、追求卓越、团结协作、奉献社会的数字社会风尚。同时,培育数字社会的公共理性,畅通拓展青年网络表达的绿色通道,充分保障其言论空间和表达权利,及时收集青年的意见、回应青年的诉求,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机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切实服务青年发展。加强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和监测,提升对门户网站、社交平台的监管力度,运用数字手段加强对网络内容、传播行为和传播影响的即时感知、科学评估和快速应对。及时阻断负面舆论、不良信息扩散,引导数字媒体对热点问题进行全面、客观、专业和持续的报道和评论,保障青年知情权,提升政府公信力,使多元价值观在交流中融合,凝聚数字社会价值共识。此外,促进多元主体网络共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

空间治理体系,使青年从围观网络道德现象的“看客”转变为网络治理的参与者、公共秩序的捍卫者,引导青年做公道正义的践行者、守护者和推动者,构建网络道德治理共同体,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形成人机互动、虚实社会融合共善的良好局面。

3. 尚美:丰富数字生活实践

马克思生活理论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18}。实践是生活世界的基础,也是意义生成的源泉。人的实践活动是审美的活动,劳动创造了美,人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对象世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3]97}。审美实践活动使人从人化的自然世界中感悟自身的本质力量,领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精神愉悦和生活意趣,追寻意义世界真、善、美的自由和统一。

在生产实践方面,要提升青年数字劳动能力。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5]52},而生产生活是“产生生命的生活”^{[5]53}“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89}。因此,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数智时代需要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劳动者,只有具备与现代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要求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才能汇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活力。青年是推动数字技术迭代升级的创新主力军,也是促进数字社会发展的劳动实践者,要鼓励青年积极融入数字社会发展,增强主观能动性,自觉参与数字创造,提升综合素质,主动应对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帮助青年直面数字未来,开阔国际视野,建立前沿数字化思维,提高先进数字化专业能力,聚焦数字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激发数字科技的创新活力。构建多层次、全周期的职业培训体系,根据不同行业和岗位需求,开展订单式数字技能培训,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为青年提供便捷有效的继续教育资源,提高青年主动学习和终身学

习的能力,提升专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数字职业能力。增强青年的数字生产技能,拓展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沟通能力,将数字技能转化为数字产品并创造劳动价值,使青年成为能适应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社会转型的创新型劳动者。引导青年超越个人叙事,加强社会实践,更好把握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加深对现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将个人青春价值的实现与数智时代发展相结合,服务奉献社会,提升精神境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青年作为新就业形态的主要群体,要保障其劳动权益,完善面向新型劳动者的法律法规体系,保障其依法享有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福利等权益,及时解决数字平台中算法管理导致的结构性力量失衡等问题,消除青年在数字劳动生产中的后顾之忧,营造健康有序、公平正义的数字劳动环境。

在日常生活方面,要丰富青年数字文化生活。文化既是“人化”的产物,也有“化人”的功能。“意义世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是一个精神文化的世界,是一个观念性精神文化的世界。”^[23]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整体,文化以各种方式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养分,赋予人的生活以意义和力量。数智时代的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底蕴和文化建构,为此要引导青年提高数字文化实践能力,找寻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核,主动摆脱庸俗圈层文化,克服碎片化、功利化算法导致的审美偏见,抵制低俗化、泛娱乐化的倾向,建立理性、高雅的审美态度,形成刚健深沉、质朴澄明、守正创新的审美品格,丰富审美生命体验和文化实践。面向青年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数字文化需求,强化高质量数字文化供给,创造满足青年发展需求、增强其精神力量的优秀文化产品。将数字化应用作为文化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培育和壮大数字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数字文化产品的情感表达力和文化传播力,推动各类文化业态协同融合发展,促进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文化新体验。以数字技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经典文化作品、非遗项目、民间文艺等进行数字化再创

作,融入时代元素,激活数字生命力,促进全景呈现、全维度阐释和全媒体传播,使青年近距离、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恒久魅力。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把崇高价值、美好情感融入数字文化作品,以深厚的内涵、开阔的格局和光明的气象滋养青年,提升其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文润心,引导青年在纷繁复杂的数字世界中建构意义世界,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统一起来,依循美的规律去创造更美好的数字生活,追求更高雅、更智慧、更有意义的人生。

参考文献:

- [1] 陈忠.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全面生活理论”之比较[J]. 江苏社会科学, 2005(6): 55-5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张懿, 夏文斌. 马克思的意义世界理论探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9(5): 45-52.
- [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6] 吴静. 算法为王: 大数据时代“看不见的手”[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4(2): 7-12.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8] 王水雄. 数字技术重塑社交格局: 逻辑机制与现实挑战[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9): 15-23.
- [9] 吴海琳, 曾坤宁. 元宇宙视域下的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转变[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1): 187-194.
- [10] 殷筱, 房志敏.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经济何以可能[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3): 31-41.
- [11] 周露平. 美好数字生活的反思与建构[J]. 学术论

坛,2024,47(1):100-109.

[12] 樊浩. 生活世界—意义世界:人类文明的两轮[J]. 探索与争鸣,2023(6):5-8.

[13] 顾爱华,孙莹. 赋能智慧治理: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与价值实现[J]. 理论与改革,2021(4):47-57.

[14] 冯建军. 网络公民教育:智能时代道德教育的新要求[J]. 伦理学研究,2022(3):1-9.

[15] 陶志欢. 当代青年网络生活极化现象的形成机理与双重特性[J]. 青年探索,2023(4):76-86.

[16] 王寅申. 数字社会转型中青年意义世界的深化和构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1):192-197.

[17] 阎国华,韩硕. 辨识与应对:网络圈群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审视[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1):29-38.

[18] 王品芝,丁香雪钰. 越刷越心累 86.1%受访者会漫无目的刷手机[N]. 中国青年报,2023-07-14(03).

[19] 杨国荣.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J]. 学术界,2008(5):47-56.

[20] 柴秀波. 马克思的意义理论略论[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15(5):10-12.

[21] 冯契.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31.

[22] 丁恒星. 传统耻感文化与网络道德治理[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20(2):19-24.

[23] 徐贵权. 论意义世界[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11-16.

How Is the Meaningful World of Youth Constructed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Life Theory /WANG Fei¹, LUO Xiaochun²(1.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Base of Jiangsu Research Center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2. School of Law and Administratio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aningful world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value in people's daily lives. Marx's theory of life centers on human beings,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mselve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as its main content. It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living world and strives to construct a meaningful living world for human beings.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s reshaping the living world of young people, who are confronting new existential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 shifts, including diversified subject identities, suspend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oncealed practical fields. The virtual space-time crea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omewhat erode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young people's living world,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s under precise algorithmic logic, moral deficiency in virtual communication spaces, and disorientation of values in the concealed field of practice. Constructing a meaningful world reflects human nature, aiming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uch a world involves a constant pursuit of the spiritual realm encompassing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Young people are the drivers of digit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digital society. Guiding them to actively construct a meaningful world in the digital realm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ir holistic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awaken young people's awareness and cognition of this meaningful world, guide them to develop a correct perception of the digital world, strengthen their digital identity, cultivate digital ethics, optimize digital interactions, enrich digital labor practices, and enhance digital cultural experience. This will enable young people to consciously construct a meaningful world amidst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digital realm, pursuing the freedom and un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a meaningful world, young people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ife and existence, allowing them to dwell poetically in the digital society, create meaningful digital lives, and become digital citizens who are well-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Key words: Marx's theory of life; youth;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digital living; meaningful world; digital citizens